

近年来,“饭圈”粉丝频频以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引发社会的关注和不满。“饭圈”中的网络骂战、网络暴力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网络文化环境。更有甚者,当涉嫌违法犯罪的明星被警方刑拘后,“饭圈”竟有粉丝提出“探监”“替换”,乃至“劫狱”,直接挑战社会法律道德底线。“饭圈”文化从“圈地自萌”发展到今日乱象丛生,原因自然有许多,其中之一可能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于粉丝文化和“饭圈”文化的认识、研究不够,更谈不上积极引导。

“饭圈”文化是广义的粉丝文化的一部分。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借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来解释当今中国的粉丝文化,但往往有隔靴搔痒,乃至削足适履之感。首先,当今“饭圈”并非如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而是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内部有专业细致的分工,比如打投组、宣传组、反黑组、净化组,并且目标明确,效率极高。其次,粉丝文化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言的“文化工业”,它并不是自上而下产生,而是自下而上形成;粉丝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消费者。再次,“饭圈”粉丝也不同于詹金斯眼中的“盗猎者”,更像是“数据劳工”和“韭菜”。也有学者借用以杰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粉丝文化,但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质是尊重差异和多元,“狂欢化”理论强调的是平等和对话,这往往是饭圈文化所欠缺的。还有学者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归结为特定情结或对理想自我的追寻,这种简单化的归因,往往也与复杂的粉丝情感不符。总之,直接套用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粉丝文化现象,表现了学界的理论焦虑,但往往表现出“理论先行”,普遍存在“强制阐释”的问题,与中国粉丝文化的现状并不契合,忽视了粉丝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对当今中国粉丝文化乃至大众文化的认识。除了简单借用西方文化理论,学界对于粉丝文化研究对象本身的了解和认识也远远不够,普遍表现出对粉丝文化的隔膜,不熟悉社交平台、媒介,不熟悉粉丝群内部的运作模式和生产机制,因而倾向于宏观笼统的分析,缺少深入具体的研究,并且在分析上往往体现出简单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倾向。

中国粉丝文化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为世界所少见,我们应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事物本身”。首先,应以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粉丝社群的文化语境和媒介场域之中,真正把握粉丝文化的特征与类型、生产与消费以及与其他社群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次,期待更多“学者粉”积极介入网络,开展线上的文化批评。与其他网络文化类似,粉丝文化研究与评论的主阵地在线上而非线下。“学者粉”具有双重身份,既熟悉研究对象,又注重自身的责任和批判意识,有利于积极探讨引导主流意识形态向粉丝文化嵌入,从

(上接第1版)“将一名写作者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各届中做比较,这样的荣誉足以令人珍惜。”

这种对长江的天然亲近和生死羁绊,驱使他多次行走于长江沿岸,用天文量万里长江的境界。当他随着“南水北调人行走”采风团队来到丹江口水库时,心中曾闪现出一个念头:这是一场与山水盟约的长途行走。刘醒龙说,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但面对长江,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连一滴水、一片云都不是,更别说将自己认作是来写长江的作家。他将南水北调工程从头走到尾,又将万里长江从头走到尾,刘醒龙相信,这才能抵达文学的“第一现场”。他说,无论是时下还是既往,没有到达第一现场,而将第二或者第三现场当成现实与真相的文字不在少数。与真正现实脱节的写作,很快就会显示出无效性。现场的意义有着无限的可能,远离现场,单纯读与写,那些看上去很美、很复杂的思考,很可能只是一种“非分之想”。一旦抵达现场,所思所想就会变得简明且坚定。行走的意义即是如此。

这种“行走”的态度展现了刘醒龙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文学固然给予人们一种观看和理解现实的新视角,但也只有投身于正在发生的千姿百态的现实,才能不断赋予“文学”更开阔的内涵。刘醒龙笑言,男人是习惯在原野上奔突的文学,哪怕拥有一台能够连接全世界的电脑,成年累月待在某个高档小区,也会褪色变成像是吃米饭的小白脸。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走上几十天,走过上万公里,即便不是为了写作,就只是为了锻造人的性情,也是莫大的刺激。如果再以文学的名义,如此行走下来,会是对已被消耗的文学元素的超级补充。万里行走的浩然之气,不需要额外想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弥漫到新的创作当中。

武汉七十六日,一个普通人的在场

生活在武汉,刘醒龙也是2020年初那场惊心动魄的“抗疫之战”的亲历者,他用长达20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记录下了离汉通道暂时关闭的76个日夜。最初,他拒绝了多家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因为当时正是所有人的艰难时刻,气氛紧张,许多事情都超乎人情常理,连每天呼吸的空气都不新鲜,尽管互联网上充满几分钟就能达到“10万+”的“真相”,但想要成为文学所能抵达的真正现场,光靠一点脑细胞是不行的,还需要开开刀,走进现实深处,用自己的神经末梢进行感

而在包容和认同的过程中调整粉丝文化的发展,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功能。再次,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艺术生产的研究路径。目前学界更多从文化研究的路径来考察粉丝文化,这条路径往往将粉丝看作消费者,包括积极受众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粉丝劳动者的身份,忽视了粉丝作为“数据劳工”和“被剥削”的问题。最后,粉丝研究应不囿于某一确定学科,大力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粉丝文化本身包含文本、媒介、文化和资本等多个要素,涉及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只有打破学科界限,才能更清晰完整地认识研究粉丝文化,进而引导其健康发展。

从“饭圈”自身来看,种种乱象也亟须大力整治。当前的饭圈文化是“多方共输”的局面。首先,粉丝首当其冲为当前“饭圈”生产运作模式的受害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方面,出于对“爱豆”的情感,“饭圈”粉丝“为爱发电”,“自愿”成为“数据劳工”,通过不断发帖、点赞、打榜等,尽力完成网络平台的各项KPI;另一方面,粉丝被不断灌输“爱他/她就为他/她花钱”的消费理念,成为“韭菜”被娱乐资本和品牌方不断收割。其次,偶像在“饭圈”文化的生产运作模式下,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也迷失了自我,只剩下“人设”。“人设”与偶像的真实性格无关,而是最重要的卖点。偶像也不注重提高演技或唱功,只要利用流量,兜售“人设”即可,但是一旦“人设”崩塌,立刻会被资本方弃用,最终也会被迫粉丝抛弃。再次,娱乐和影视节目制作方往往也会成为“受害者”。在当前的运作模式下,娱乐和影视节目制作方也被平台和流量绑架,制作方首先考虑的不是偶像明星的演技和德行,而是是否顶流,最终节目的艺术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一旦偶像崩塌,节目可能血本无归。唯一受益的可能是平台和资本方。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整治重点为网络平台、艺人经纪公司等主体,这正是在进一步加大对整治力度、切实突破重点难点问题所作出的有效举措。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将为普通网民和粉丝营造一个更为清朗、和谐、健康的环境。

“饭圈”文化今日出现种种乱象,并非表明其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引导。“饭圈”粉丝往往带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怀和集体意识。2019年在香港暴乱事件中,“饭圈女孩”用“饭圈”特有的话语回击乱港暴徒,高呼“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中国)”“中国永远是最大的爱豆(偶像)”,引来社会各界的支持。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许多粉丝团体捐款捐物,在关键时刻筹措了大量防疫物资,有力支援了抗疫一线。这也表明粉丝文化与时代、国家同频共振,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学院)

知。刘醒龙说,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在场感已经成为一种陷阱,越想写得身临其境,越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合格的写作、优秀的作品,其状态都应当是“在场”的。当代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其状态没有“在场”。既不在文学现场,也不在人生现场,甚至连生活现场都不在。

今日回望,他依然认为,疫情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这些万众关切的问题,是与文学毫不相干、须得用纯粹科学技术应对的难点。那时能够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

疫情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迫使人们对自身的生活、生命进行审视。特别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研究,只能依靠个人的基本经验和品质即时进行判断。武汉战“疫”,对全中国是一次闭卷考试,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也是一次闭卷考试。在囿于斗室的日子里,刘醒龙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害怕,像普通人一样焦虑,像普通人一样热爱,像普通人一样勇敢,像普通人一样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自身防护。“‘封城’那一阵,老记着自己是个作家,是不道德的。”关于疫情的大部分文字是他作为普通人一天天慢慢积攒起来的,积攒到后来就成了一本书。“如果有谁在这本书里面读出一个作家的影子,那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失败。”刘醒龙说,“这是由一千一百万普通市民中的这一位亲自写成的,是身陷疫情险境中的这一位为应对万一而写的与妻书、与儿女书和致慈母书,也是一位普通武汉市民、普通中国人写给他所热爱的城市、他所热爱的祖国、他所热爱的时代的致敬书。”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宁肯回老家种地打鱼,也不要再搞什么文学。刘醒龙认为,相较于那些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真的不如过一种种地打鱼的日子。特别是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做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灵魂与血肉,就是灵魂,就是血肉,舍此之外,与其他任何东西无关。而文学的灵魂与血肉,应当是此生此命有没有为划时代的出现而分享过艰难。

加强饭圈文化管理

白玖佳黛

饭圈也称为粉圈。根据百度百科的简单定义,是粉丝圈子的简称。而粉丝的圈子的规则是娱乐界、依赖于明星和粉丝而生存的娱乐产业、媒体以及粉丝社群共同铸造的。日前,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清朗饭圈”行动在近期迎来了数轮前所未见的新规定和新通知。这些新规定把清朗行动的对象指向了平台媒体、娱乐产业资本和明星,可谓用力用对了方向,但其后效果仍然有待观察。

而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偶像产业和粉丝经济是否可以既满足粉丝的情感需求,又产出有积极意识形态导向的优秀作品和杰出人才呢?

粉丝研究有几个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英国的左派文化研究学者出于批判兴趣对亚文化的关注。他们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批评,认为其使得工人阶级产生虚假意识而非意识觉醒。与此同时,为了寻找意识觉醒的希望,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后来,赫伯迪格、麦克罗比等都从各种人群的亚文化中发掘出了反抗主流文化的风格。而主流的商业文化为了牟利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也在不断收编这些新的亚文化风格。在被收编的过程中,抵抗性的意识形态被去政治化了。冯应谦曾梳理过恶搞视频被商业收编的过程。在近几年,说唱通过《中国有嘻哈》系列节目,逐渐褪去了当初作为黑人街头艺术时对种族和阶级问题的关注,也褪去之前作为大陆的地下艺术时的江湖气,越来越多地呈现商业化趋势,如作为广告说唱歌曲给信用卡、汽车等商品打广告。

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继媒介和传播研究对受众的认识完成了从被动受众到主动受众的完全转向之后,在亨利·詹金斯的引领下,粉丝研究发生巨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粉丝的能动性得到承认,其自组织起来的集体行为被认为是与作品制作方争夺权力的游击战。杨玲在其对超女的研究中也梳理过90年代后期的第二波粉丝研究。这波粉丝研究吸取了布尔迪厄的“消费社会学”,虽然承认了粉丝们对媒介文本制作者的影响,但这种来自粉丝的影响推行的是其群体品味,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也就不带有抵抗特征。可以说,粉丝研究从承认粉丝的能动性,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问题变成了:粉丝的能动性究竟在推行着什么样的文化,

以及这种文化中是否还带有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政治性或者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政治性了?

第三个时期的主旨是粉丝问题随着媒介问题的复杂化所产生的扩展。杨玲总结认为,自2007年开始,学者对粉丝的研究从媒介文本的粉丝延伸到了广泛定义的媒介的粉丝。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来看,就是从《星际迷航》的粉丝,扩展到了对球迷、电影迷的研究,连苹果和小米也开始拥有粉丝,而在我国,粉丝之间进行社交联系的中介物品甚至变成了尹一伊所指出的新的中介物——数据。学术界这一关注点的变化所应和的是:随着传统媒介的融合和资本逻辑对消费者过度消费和高粘性的需求,媒介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而随着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增加,随着资本不断开拓新的商品化方式和剥削方式,粉丝现象也弥散到了与媒体和资本共生的更大的空间内。

这三个时期的粉丝研究的影响在此时此刻仍然是重叠存在的,只不过学者们选择采用不同时期的框架来分析当下的媒介现象。从媒介文本生产的角度来看,主流价值观的优秀作品是否只有“选择流量明星出演主角或配角”这样一条路可以选择呢?是不是年轻粉丝就只会因为自己的偶像出演了某部作品而去观看,而不会因为作品的主题和制作水平去欣赏它呢?2020年初《隐秘的角落》等剧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观众欢迎的是优秀的作品和表演,是可以反复琢磨角色动机和感情线的设定,是或细腻、或难以预料、或传神到可以出表情包反复使用的表演,是可以反复观看的既符合逻辑、耐人寻味,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剧情设计,是不经意中出现却又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线索,是导演、编剧、动作设计、道具设计、服装化妆和演员表演配合而制作出的优秀作品。《琉璃》《棋魂》《终极笔记》等剧都是这样的例子。

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也具有吸引粉丝的能力。比如,孔书玉对《潜伏》的粉丝进行的研究认为,粉丝们从这部剧中,除了看出革命道路的艰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机智和奉献,也看出了“办公室政治”的微妙隐喻。当时的粉丝文本活动还大量存在于百度贴吧中。又比如,郑熙青对《伪装者》的研究发现,由于对这部剧的喜爱,粉丝们自发地去研究当年留學生回国参加革命的历史,并且将剧中角色的生命历程与著名革命家的人生经历进行联系,幻想革命家和他们之间发生联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这两部剧都制作精良,且属于具有悬疑色彩的谍战剧类型。今年播出的《叛逆者》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一类型是从反特片发展而来的。谍战剧既能满足重讲革命者奋斗史的需要,又具有侦探剧和悬疑剧的特色,耐人寻味。《叛逆者》选用了2018年主演《镇魂》而爆火的朱一龙作为主角,而朱一龙也交上了足够好的表演答卷,将林楠笙在各个阶段的认识,以及逐渐的转变表达

专家学者观摩研讨电影《我们的岁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18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章柏青工作室、珠海山中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电影《我们的岁月》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根据裴蓥原著小说《水击三千里》改编,由章柏青任策划人,谢悠执导,裴蓥任制片人。电影以南方沿海地区乃至中国近几十年的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一代人的梦想与奋斗、友情与爱情。主人公们的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命运变迁和拼搏抉择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会上,片方代表介绍了该片摄制情况,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交流。与会者认为,《我们的岁月》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表现的历史内容颇具内涵、启人心智,为一代青年树碑立传、传神写照,可谓一部向那个时代及其人们的青春和理想致敬的优秀影片。全片整体风格清新、自然、流畅,影像独特唯美,有较强的艺术质感,对年代、氛围和代表性文化符号的细节还原真实准确,人物个性和情怀刻画栩栩如生,充满积极奋进、打动人心的励志正能量,传递出对社会、哲学及人性的思考。

“诗咏新时代·太湖鼋头渚采风”举行

本报讯 9月23日至25日,由十月杂志社主办的“诗咏新时代·太湖鼋头渚采风”活动在无锡市举行。《十月》主编陈东捷、《诗人》主编宗仁发、《钟山》主编贾梦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编辑家、作家和诗人参加活动。

太湖鼋头渚是无锡境内太湖西北岸的一个半岛,因巨石突入湖中,状如浮鼋而得名。郭沫若“太湖绝佳处,毕竟在鼋头”的诗赞,使鼋头渚风韵名扬海内外。活动期间,诗人、作家们深入鼋头渚,问茶解蟹,登高揽胜,了解当地环境保护和文旅发展的情况,交流诗文创作。据介绍,本次采风活动的成果将由《十月》杂志以小辑的形式择机推出。

创造优秀文艺作品

到位:他从懵懂,到面对同志牺牲自己保护自己的选择,到逐渐分辨和选择了站在党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上,成为卧底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一名成熟而坚定的共产党情报人员。与此同时,王志文、王阳、张子贤等配角丝丝入扣的表演也撑起了整个剧中人物的群像,让观众不仅欣赏到了老戏骨的演出,还惊喜地发现了青年演员们的表演能力。

革命历史题材的另一吸粉渠道是革命美学 的钻研和创造。今年播出的献礼剧《觉醒年代》即是如此。在微博上,诸多营销号和粉丝量大的粉丝账号都发布或者转发了其中的一些片段,特别是陈独秀送陈延年和陈乔年去法国留学的送别场面。该剧所主要再现的历史片段并不包含延年和乔年之后英年牺牲的时间点。但在这一幕中,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和旁白,陈独秀送别延年和乔年的时候,他们二人齐整的装扮,和两人被捕、被刑讯逼供,继而被害的时候两位年轻的烈士备受摧残的容颜和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延年和乔年的身体饱受摧残,但是他们的眸中呈现的是坚定的信念和无惧死亡 的勇气。微博上的转发中出现过很多赞叹,比如“国家队一出手,就知有水平”,以及对革命烈士在自己的年龄就已经为救亡和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崇敬之辞。陈独秀送别延年和乔年的片段广泛传播,吸引了许多年轻粉丝去观看《觉醒年代》。而且,该剧中许多角色的演员给出了“剧抛脸”级别的表演。他们不仅与自己以往的角色产生了明显区别,而且非常贴近自己所出演的历史人物。比如马少骅饰演的蔡元培,在扮相上与人物十分贴近,而且他三次请陈独秀去北大工作的片段也表现出了蔡校长 的风骨和待人接物的态度。虽然对该剧呈现的这一段历史的细节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同时,一些学者对这一段历史具体脉络的梳理和整体的评价可能也与该剧呈现的剧情有一定的分歧,但《觉醒年代》为如何用高级的影视美学和表演,交出了当下主旋律革命史题材剧可以做到的一个较高水平的答卷。其在年轻人中吸粉的现象也说明,这样的优秀作品可以和学校教育相呼应,娱乐和教育两不误。

以往的亚文化、媒介和粉丝研究回答了很多问题,但结合我国的媒介和文化实践,也有许多新的问题是亟待展开的,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站队的判断,并且开始基于身份和立场进行论战。如果说资本逻辑下媒介的发展将商品化和去政治化的思维扩散开了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基于自己已有的立场,参与网上讨论,推广自己喜欢的作品和风格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文艺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日前国家新推出的政策和禁令都在试图减弱资本牟利逻辑对网上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如何能够就真正的问题展开讨论,创造更多叫好又叫座 的优秀作品,则是我们要面对的新挑战。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白航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星星》诗刊原主编白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5岁。

白航,原名刘新民,中共党员。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蓝色幽默》《白航诗选》《诗歌创作漫谈》《简论李白和杜甫》等。

未央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未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6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未央,原名章开明,中共党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祖国,我回来了》《大地春早》《假如我重活一次》《巨鸟》《怒潮》等。

徐应佩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通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徐应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19日在江苏南通逝世,享年86岁。

徐应佩,笔名徐余,民盟成员,致公党成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等。

尤凤伟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岛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尤凤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9月23日在青岛逝世,享年78岁。

尤凤伟,中共党员。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石门夜话》《中国一九五七》《生存》《布谷催春》等。